

明治改历:政府与民间的博弈

肖义峰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

摘要:1872年,日本启动了“明治改历”,废除了沿用千年的太阴历,改用太阳历。这场历法改革是日本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一部分,明治政府在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对旧历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并通过对出版物的管理全面垄断了历法的编写与出版,将政府的意识形态与官方信仰注入到新历法当中。日本政府对旧历的改造体现了其对民众社会生活的控制。

关键词:明治改历;历法;明治维新;文明开化

中图分类号:K31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6-0050-08

历法的颁布,对社会而言,自古以来便有着两层含义:“夫历者,上乃王政之定盘,下乃稼穡之指针也。”^[1]日本从1872年11月9日改历诏书发布,到次年12月3日作为1873年(明治6年)1月1日开始使用新历,再到1909年(明治42年)旧历被完全废除。明治改历运动完成了日本由太阴历向太阳历的转变。但彻底禁绝旧历,采用新历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直到二战结束时日本政府也未能彻底完成这一目标。

以往对于明治改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改历的性质、历史地位、作用、影响的认识上,或认为改历破坏了日本的传统造成了不良后果、或认为改历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①。而较少注意到政府在推行改历的过程中加强了对于历法和出版物的控制、推进了相关立法,将统治阶层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注入历法当中,强化对社会控制这一方面。换言之,明治改历绝不仅仅是一次历法的改变,还是日本政府体现自身权力和控制力、践行自身意识形态的行为,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将试从改历思潮的产生、相关法律的制定、对旧历法的改造、对历法出版物的管制,民众的反应等几个方面,对明治政府进行的这一运动进行探讨,并努力展现改历之下民众的真实状况。

一、明治年间的改历思潮

自1853年开国以来,日本与西洋的接触愈发增多,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认识到日本和西方所用历法的巨大差异。这种巨大的差异也反映在了外交事务中。如在《日米修好通商条约》的结尾日期处,便以如下形式进行记录:

安政五年午六月十九日,即千八百五十八年,亚米利加合众国独立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2]⁴⁵

在当时的对外条约中,不得不同时标注两种日期,即日本日期和西洋日期。为了应付日益频繁的日常换算工作,时任幕府天文方的涩川景佑编写了《万国普通历》,对和历和洋历进行换算^[3]¹⁵⁴。

在“计时”问题上,日本与西方不仅年月日不同,在每日的时间上也存在着差异。江户时代以来,日本人采用的是通过日出和日落来确定时间,将昼夜进行六等分的“不定时法”。于是,旧历法中的每天和每个节气的长短都是不固定的^[4]³⁶。这种计时法虽然和农业生产相适应,但与太阳历相比准确性相差甚远。

明治维新之后,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日

收稿日期:2020-03-02

作者简介:肖义峰(1995—),男,甘肃兰州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对于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主要有李卓的《探微日本明治改历》(见于《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主要从日本的历法传统、新历法带来的不便、改历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的角度对明治改历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是一场“粗暴的改历”。王晓葵的《明治改历与近代时间秩序的重构》(见于《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暨第三届中国高校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认为明治改历反映了一个社会政治力量和“传统”“文化”习俗力量的角力。朱珠的《日本近代时间意识的形成》(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则认为明治改历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在历法领域迈向近代化。

本开始了加速向西方学习的“洋化革命”，时间历法的改革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1872年（明治5年）十一月九日，太政官发布布达（布告的一种）第337号，即《改历诏书》宣布：

（1）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以即刻到来的十二月三日作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

（2）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个月，每四年置一天为闰。

（3）迄今时刻按昼夜长短分十二时，今后改时辰仪，时刻昼夜平分定二十四时，子刻到午刻分十二时，称午前几时，午刻到子刻分十二时，称午后几时。

（4）时钟自一月一日起更改。

（5）诸祭典等旧历月日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5]429}

改历诏书的突然发布，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十一月九日宣布下个月的三日直接进入下一年，这中间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十二月三日日本直接进入明治六年时，日本的许多偏远地区可能都还没有收到诏书^{[3]134}。

至于突然实行改历的原因，根据《大隈伯昔日谭》，认为主要有岩仓使团出访后，留守政府急于推进近代化政策，并且可以少发两个月薪水以缓解财政危机等考虑^{[3]147}。

明治改历这一事件的发生，必然与当时上层对于新旧历法的看法及改历的思潮有着直接的关系，要分析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便是太政官权大外史坂塚明毅发布于1872年11月初的建白书，这一建白书在内容上与改历诏书有诸多相似之处，被认为是改历诏书的蓝本。建白书中写道：

方今国家致力，百度维新，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如历法者最应改正之……盖太阳历以太阳之缠度立月，虽日子多少有异，而无季候早晚之变，每四岁置一闰日，七千年后仅生一日之差而已，太阴历与此相比其便与不便固不俟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而未采用者如太阳历，各国普遍用之，独我用太阴历，岂不便耶，应速改历法。……时刻也用昼夜中分之时。令天下颁行太阳历之日，亦应改行时钟之制。如此，不仅历法得正，亦助国

民之开化。^{[6]189}

从中可以看出，坂塚认为，太阳历优于太阴历，没有复杂的置闰问题，精确度高，且较为方便，而且改用太阳历有利于与外国交流。坂塚作为内务省地志课长，其观点自然可以代表一部分留守政府高级官员的看法，而此时远在欧洲的岩仓使团领袖岩仓具视，其观点与坂塚不谋而合：

与各国交往以来，以其制度文化器物辅助我国，勉力革正旧习，使全国人民向文明之域日夜前进。而就在此时，唯有历法依然沿袭旧式，此乃甚不妥之事。特别是过去太阴历中下段所印之物，实乃妄诞无稽之属，妨碍民智之开达，且各国皆用太阳历，唯独我国用太阴历，其不便自不必说……^{[7]1211}

岩仓支持改历的理由主要有这几点：1. 有利于学习西方文明；2. 有利于文明开化；3. 各国都在使用太阳历，只有我国使用太阴历。另外，材料中有一句“过去太阴历中下段所印之物，实乃妄诞无稽之属，妨碍民智之开达”，这里表达了对过去历法中的所谓“历注”的反感。

明治改历之后，当时的社会对于新历还产生了许多疑虑，面对这种情况，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由“维新知识分子”所写的宣传新历的书籍，其中，福泽谕吉的《改历辨》是其中销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书籍。而且其发布的时间也非常早，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便已出版，此时距离改历诏书的发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改历辨》详细介绍了新历的种种优点与旧历的不足之处，甚至将其与封建制度挂钩，证明其落后性。在这本小册子中，福泽首先用大量的笔墨论述新历的种种优越性，然后深刻地批判了旧历的落后，列举了如“历日与季节不一致”“迷信历注危害”等缺点^{[8]4-5}。

为了鼓励大家使用新历，福泽更是以严厉的口吻说道：

只要说到其本来的缘由，无论如何新奇的事情也不足怪。这次的改历若不知其缘由，如果只是听到“十二月三日要变成正月的元旦了”，便一味地传播的话，确实是应当惊讶的事情，即便如此，如果能稍稍读读人们平时该读的书，明白一些事物的道理，是不会将其当做惊讶的事情的。因此，对此次改历大惊

小怪的日本国中的人,必定是不学习的文盲笨蛋。而不以此为怪者必为平时在学问上用心的智者。因此,仅此一条,便可作为区分日本国中的智者与笨蛋的区别了。^{[9]13}

在这里,福泽将乐于接受新历的人称作“平时在学问上用心的智者”,将不愿意接受新历的人斥为“不学习的文盲笨蛋”,将是否接受新历形容为“智者”与“笨蛋”的对立。福泽不仅将对改历的态度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还上升到了人品及智力的层面。

坂塚明毅、岩仓具视、福泽谕吉三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留守政府、使团成员及上层知识分子对于新旧历法的认知。明治改历虽然仓促武断,但也得到了当时社会上层的支持和拥护,这种支持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1905年,知名外交官、知识分子末松谦澄(1855—1920)在英国和他的贵妇人朋友谈论起这件事时还充满自豪地说:“我国的历法如今完全与贵国是统一的了”,“我们相信采取像这样的处置乃是政略上的大胆的快举”^{[9]118}。

政府成员与维新知识分子呼吁废除旧历、采用新历,其主要出发点便是“文明开化”,同时也是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然而,仅仅依靠呼吁,是无法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由旧历向新历的转换的。

二、明治政府对历法出版物的管制

在江户时代,包括京历、江户历、神宫历以及各种地方历法,都是作为一般出版物出版的,政府并无强制限制^{[10]254}。事实上,幕藩体制下的德川家并没有能力统一全国的历法出版。新政府成立之后,原本便负责编订历法的土御门家向政府提出了继续编历的申请,1868年7月9日政府下达了“土御门春雄造历及颁布”的许可,称为弘历者。作为弘历者的土御门家统领了明治初期的历法颁布,开启了官历专卖的时代^[11]。

1870年(明治3年),颁历的权限由土御门家移至大学,同年4月22日,太政官发布布达:

颁历授时之仪乃至重之典章之故,近来各种各样的历书在世上流传的事情,乃是无谓之事。现在决定,除弘历者之外其他人皆不准从事天文观测。^[12]

这一命令宣布,除了政府任命的弘历者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颁布历法。这一法令被学界认为

是取缔“伪历”的最初命令^[12]。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869年(明治2年),根据《太政类典》的记载,太政官便已经向东京府发布了太政官令:“府下除弘历者外,禁止发行历法及雕刻略历”^[13],可见,在明治三年布达发布之前,政府便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实行历法取缔政策,打击弘历者之外的私人历法出版了。

1872年(明治5年),全国的颁历者组成了大阪颁历社和东京颁历社两大颁历社,并取得了历法印刷和贩卖的独占权^{[11]256}。但是,这一年11月发生了改历,颁历商社已经提前印刷完成的明治六年历变成了一堆废纸。颁历商社遭受了重大损失。为了补偿商社的重大损失,政府延长商社的颁历许可一直到1882年(明治15年)。于是,从1874年(明治7年)到1882年(明治15年)这八年间,颁历商社一直享有独卖权^[12]。

另外,明治5年改历时,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政府紧急发出布告,允许各地自行印刷明治6年的历法,事实上打破了之前的专卖令。但是,自行印刷的历法被命令不得印刷旧历的历注^{[14]429}。

1882年(明治15年),颁历商社的独卖权结束,专卖特权转移至伊势神宫(即神宫司)。当年的太政官布达第8号明确规定,从1883(明治16年)开始,本历(成册的日历)及略本历(较简略的日历)由神宫司厅发行,民间可以依据出版条例出版一枚折略历(只有一页的挂历)^[15]。

1890年(明治23年)文部省对1882年(明治15年)的太政官布告进行了补充,正式规定了民间可以出版的一枚折略历上面可以出现的具体内容。内容如下:

一枚折略历仅限于记载以下所列的各项事项:

1. 年号及纪元年数干支
2. 每月的一日
3. 日月食及其时间
4. 大祭祀日及神社例祭日
5. 日曜表甲子表庚申表己巳表
6. 二十四节气及杂节
7. 新月满月
8. 以上第二至七条皆采用阳历日^{[16]429}

自此,官方不仅牢牢掌握了历法的出版权,还限定了历法的内容。历书上的所有内容都需要经过政府审核方可发行,否则便会违反出版法。

没有了载体,历法便不复存在。而包括日历、

台历、挂历在内的“历书”便是历法的传播和使用的载体。历书的本质是“出版物”，于是，对于“伪历”的打击便理所当然地交给了出版物管理机构，而不是历法管理机构。1876年（明治9年）内务省第39号布达正式承认了历书属于出版物的一种，并施行检查制度，这一规定正式确定了政府对于历书采取管理出版物的方式进行管理。在1893年（明治26年）4月，明治天皇颁布出版法（4月第14号法律）之前，明治政府一直是以出版条例来对书籍出版进行管理的。早在明治元年的闰四月便发布了布告（14丁），规定“未经官方许可便刊行的书籍不得买卖”^{[17]349}，标志着明治政府对出版业管制的开始。1869年（明治2年）5月13日行政官达规定了出版条例的雏形^{[18]349}。同年六月第15丁布告的发布则代表着出版条例的正式施行。此后，明治出版条例进行了三次修改。1872年（明治5年）正月十三日文部省发布的布达（无号）《改正出版条例》是对出版条例的第一次修订。之后的1875年（明治8年）太政官第135号布告颁布新的出版条例是第二次修改^{[18]15}。1887年（明治20年）12月28日，颁布了敕令第76号，这是对出版条例的第三次修改。明治20年的这部新的出版条例中，第16条规定“对认定为妨碍治安，坏乱风俗的图书，内务大臣将给予‘发卖颁布禁止’处罚并扣押刻本印本”^{[19]45}。这一条文相对于之前的1875年（明治8年）10月5日的改正版是新增内容，而且在1901年（明治26年）的出版法中被保留下来。

关于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具体如何实施呢？当年的一部警察法讲义介绍道：

当发现与之（指只能由神宫出版的本历以及略本历）类似的著作物，内务大臣应在官报上发布禁止其发卖颁布的告示，同时地方官厅应对本人进行训斥……为了统一起见，应当采取地方官发现上述出版物，报告给内务大臣，内务大臣将其认定为“历类似”，然后地方官再发布对其执行处分的命令。^{[20]178}

此外，在这本讲义中，作者还讲述了在遇到无法作为出版物处理的历书及略历时，该如何管理，以免被含有违禁内容的历书钻空子的内容。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政府对于历法的态度，远非为了“文明开化”进行历法改革那么简单。从明治改历伊始，日本政府便开始

了对于历法出版的严格管理，制定了一整套的法律规章，体现了政府对于历法的强有力控制。

三、政府对历法的改造

正如之前所述，明治改历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文明开化”“革除旧习”“开启明智”等。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革除“迷信的历注”便成为了改历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甚至在改历诏书发布之前，明治天皇遥拜伊势神宫的祝词中便有如下内容：

今年更爾曆法乎改正志繁支乎去利
煩志支乎除支豆，然有留倍支事乃限乎連爾
……^{[3]116}

（小字为万叶假名）

该祝词文体为专门用于向神灵汇报的宣命体，其中“今年更爾曆法乎改正志繁支乎去利煩志支乎除支豆”是指删除繁琐的历注，而“然有留倍支事乃限乎連爾”便是暗指去除有关吉凶的内容^{[3]116}。

而同日即明治5年（1882）11月9日发布的改历诏书中也提到：

特别是（历法的）中下段刊载的率子妄诞无稽之属，妨碍人民智力开达的东西实在不少。^[21]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更加明确地将历注（中下段）定义为妨碍人民智慧开启的“率子妄诞无稽之属”，含有传统迷信内容的历注，也就由此成为了政府严厉的打击对象。

前文所述，明治5年政府曾经短暂地允许各地私自发行历法，但内容被严格控制，在1872（明治5年）11月26日《布告》中规定道：

禁止在日历上增补于中下段刊载的“岁德“金神”“日之善恶”等一切不稽之说。^[22]

《布告》对“岁德、金神、日之善恶”等迷信的“不稽之说”的历注增补进略历的行为进行了禁止，明确地将“迷信历注”排除出了历法之外。

政府如此反感含有迷信内容的历注，自然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与高级官僚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关系，正如之前提到的塚本明毅在改历建议书中所说：“中下段的历注，除了二十四候及日月食外，皆是荒诞不羁，妨碍民智开达的东西。”^{[3]127}

那么，市面上的传统日历究竟是什么样子？其中“中下段”的历注又是如何“荒诞不羁、妨碍

民智开达”呢？本文有必要进行简单的说明。当时流行传统历法形式主要有假名历（主要用假名而非汉字书写）、具注历（写有各种注释的日历）等，它们在结构上主要分为上段、中段和下段。上段主要的内容是日期、干支。中段记载的是纳音^①及十二直^②。下段则记载了凶会日及归忌^③等内容。《布告》中所提到的岁德，金神是历中最常见到的两种历注，分别指的是阴阳道中的岁德神和金神。岁德神是“八将神”^④之母，掌管一年的福德，其所在的方角就是所谓的“惠方”，在日本元旦对着惠方吃“惠方卷”的习惯便是由此而来^{[23]94}。金神也是阴阳道的神灵，据说是金气之精，好杀伐，其所处的方角大凶，不管是造房还是出行嫁娶，都要避开^[24]。除了以上几种，传统历法中很多常见的历注总数多达近百种。以上的历注内容，毫无疑问是“迷信”，无怪岩仓和福泽都认为其“妨碍国民知识的开达”。而在明治改历后，所谓的“官历”，特别是在明治15年后长期的颁行的神宫历，在去除了“迷信的”历注后，所添加的新的内容，则主要包含两个维度：科学和国家主义。

新的历法的历注，使用科学的数据，如：日出日落的时间、太阳的赤经与赤纬、日月的中天时间、满潮干潮时刻，以及全国各地的平均降水量和有霜日等历注取代了过去的迷信历注^[12]。但是，这些科学的数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在百姓的生活中存在感不强。

另一方面，新历中也包含着对朝廷的尊崇和神宫的教化^[24]。当时，伊势神宫不仅是神道教的领袖，同时作为“神宫司”，也是国家机关。荒川敏彦认为，这种将过去的历注排除，再将关于朝廷和神道的内容加入的过程，是一种“排除他世界像，创造新世界像”的过程^{[25]49-61}。即将原有的信仰排除，将国家主义和国家神道注入历法，通过历法传播国家主义和神道，如当时的许多官历都会加入如天皇阅兵、国家工业成就等为内容的宣传画。

此外，除了历注，祝祭日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关注。伴随着祝祭日的设置，对应的庆典与仪式也相应展开，“政治仪式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展示提供平台、激发政治情感并促进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而且通过仪式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政治象征符号的作用，宣扬政治价值、维护政治秩序。经过政治仪式的洗礼，政治仪式的参与者会唤起集

体共有的记忆。权力主体通过纪念话语的表述、符号的工具性运用等手段塑造共同体记忆，为政治认同打下心理基础”^[26]。明治政府设立诸如“神武节”“天长祭”等国家纪念日对确立政治认同，塑造民族共同记忆的作用无需赘言^[27]。关于祝祭日设立及其意义，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在此不再赘述。但在祝祭日改革的过程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明治六年一月四日，太政官发布布告一号：

本次改历，决定废除人日上巳端午
七夕重阳五节，从今以后神武天皇即位
日与天长节两日定为祝日。^[28]

添加新的节日在改历之后实属平常，而强制废除节日却显得不那么寻常。有学者指出：其中的“五节句”曾被“前朝”江户幕府于1615年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为民众的“法定节日”（即所谓“公式行事”）^[29]。日本学者铃木正平将废除五节句这一行为称为：“为了表明天皇对时间与空间的支配。”^[30]明治政府对日历内容的改造，不仅是为了让其更加科学，其中也包含着浓重的政治意味。

四、幽灵般的伪历的盛行

然而，“科学的新历法”并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改历引起了民间相当大的反弹。1873年3月，福井县发生了武装骚乱，人民的要求中便有“废除太阳历”的口号。而在同年六月鸟羽县的骚乱中，也有类似的口号^{[3]244-245}。这两次骚乱虽然不是以改正历法作为主要斗争目标，但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下层百姓对于新历的不满。

突然的改历打乱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得原本按照旧历安排好的嫁娶等仪式无法进行。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便刊登了一首讽刺诗，讲述了备中甲乙两人结婚，女方家住的很远，于是早早按照新历出发，结果来到男方家，男方仍然使用旧历，完全没有准备的场景：

来遥婿家下，高枕一同眠。村中无

^①“纳音”是一种以出身年干支的五行来进行预测的一种方法，如丙寅属于炉中火，象征旺盛，乙亥属于山头火，象征无法长久等。

^②“十二直”在日本指的是“十二客”，但排序与中国的建除十二神一样，分为建、除等十二种，由月份干支及日期决定，代表不同的运势。

^③归忌为凶神，四孟月在丑，四仲月在寅，四季月在子。归忌主凶，当天忌讳搬家、娶亲等。

^④“八将神”指的是太岁，大将等八神。分别对应木星，金星等八个星宿，其位置由地支决定。

历日,如来筵不开。^{[3]244-245}

同样,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接受新的国家祝祭日也不是那么容易。《东京日日新闻》1873年11月27日便报道:

这个天长节各户虽然也挂出了国旗.但是百姓们一如往常,工商农各业照常运作,人人做生意活计奔忙。倒是旧历的重阳节,人们都蒸红豆饭、买酒烧鱼庆贺。^[30]

甚至到了大正年间,林若书在《改历的影响》中还有这样的评论:

废止了五节句盆等重要的日子、去庆祝谁也搞不清楚的什么天长节、纪元节、4月8日是释迦的诞辰日,盂兰盆节16日是地狱的锅盖打开的日子,这些连打狗的孩子都知道。而纪元节、天长节的由来就连那些官老爷都搞不清楚。^[30]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对于历法的管制长期持续着,到了1925年(大正14年),《治安维持法》开始施行。特高课开始以新闻法中的“紊乱安宁秩序”作为罪名取缔“不符合政府规定内容的历法。实际上,在查询“紊乱安宁秩序”这一罪名的认定标准之后可以发现,其中(普通15项、特殊6项)并无与“伪历”有关的条目^{[31]45-48}。关于这一问题,荒川敏彦和下村育世研究认为,这种历法上多印刷有“安宁”两个字,其内容又与“国体观念”不符,故以此为借口,强行将非法出版的历法判定为“紊乱安宁秩序”进行处罚^[11]。但即使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民众对于旧历的热情依旧不减,被称为“幽灵历法”的伪历广泛流行,早在明治年间,根据冈田芳朗的推算,“幽灵历法”的发行就已经在100万部以上^{[3]219-220}。而到了特高课接管出版物管理工作的1926年,根据《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报道:“伪历”的发行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部。报道如下:

每年年末,“不正历”便跋扈起来^①,压迫着伊势神宫神宫署发行的历书。警视厅特高课用鸬鹚和鹰一般的眼睛盯着发行不正历的人。明治初年,太政官的布达规定了由伊势神宫的神部署发行,禁止由其他人进行发行的条文。由此,每年由东京帝国大学编纂、神部署发行的,于除台湾、朝鲜外的三府四十三县颁布的太阳历,在改历后依赖需求骤减,而

依据阴历发行的“不正”历书迅速出现,而神宫署的历书现在发行不过十几万,甚至有废刊的传闻。通过警视厅的到处搜寻,不正历的贩卖者大多在初夏的时候通过团扇屋接受预定,按顺序定下合同,并在六月份的时候发送完毕,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和团扇的货款一起收款。而等到伊势神宫神部署的真正的历法出版的时候,“不正”历已经流传地全国都是,当局认为其发行数量已经达到了200万部以上了。^[32]

通过这段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 靠近年末,“伪历”猖獗,挤压了神宫历的市场,而作者认为特高课的打击会对“幽灵历法”的猖獗起到抑制作用。

2. 对于改历之后,为何官历的需求量锐减和“不正”历猖獗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不正历法上印有农家需要的播种和迷信家喜爱的方位九星等内容。也就是说,“不正历”的主要消费者是“农家”和“迷信家”。

3. “团扇屋”是人民购买“幽灵历法”的一大途径。想要购买“幽灵历法”的人往往通过团扇屋预定并交纳定金。

4. 刊载有农历和“九星”等内容的“伪历”对神宫颁布的官历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销售量巨大,可能超过200万部。

政府对于旧历的打击和改造从明治维新伊始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而这种非法的“幽灵历法”的畅销也一直持续到二战末期,被称作“幽灵历法”的伪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众对于旧历法的需求。

五、结语

当代日本知名的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研究战前日本政治史时,提出了其著名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丸山这样评价帝国日本:“日本在明治以后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从未显示过这种国家主权的、技术上的中立性。其结果是,日本的国家主义无处不将自己的统治依据强加于某种内容价

^①通过考察每年《官报》上处理“幽灵历法”的告示,发现“幽灵历法”的兴盛确实存在着季节规律。《官报》显示,查处的“幽灵历法”的数量在每年十一月逐渐攀升,在旧历正月的1,2月达到巅峰,随后迅速减少,在夏季则基本绝迹,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报道中的说法。

学出版部藏版,不明。

[21]太政官:太政類典・第二編・明治四年~明治十年・第二卷・制度二・布令揭示二,第41号,太陰曆ヲ廢シ太陽曆ヲ行フ附詔書[DB/OL].(2001-11-30)[2020-03-3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M0000000000000841660>.

[22]太政官:太政類典・第二編・明治四年~明治十年・第二卷・制度二・布令揭示二,第44号.太陽略曆板刻ヲ許ス,[DB/OL].(2001-11-30)[2020-03-3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M0000000000000841664>.

[23]伊东和彦.曆を知る事典[M].东京:东京堂,2006.

[24]西内雅.神宮曆の研究[J].神道史研究,1963(3).

[25]荒川敏彦.脱魔術化と再魔術化——排除と創造のダイナミクス[C]//社会思想史学会.社会思想史研究(26).东京:藤原書店,2002.

[26]王月.民族共同记忆的塑造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建国后抗战纪念活动的政治效用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4.

[27]有泉貞夫.明治国家と祝祭日[J].歴史学研究,1968(10).

[28]太政官.太政類典・第二編・明治四年~明治

十年・第四十八卷・儀制三・諸儀式一,第65号,改曆二付五節ヲ廢シ神武天皇即位日天長節ノ兩日ヲ以テ祝日ト定ム[DB/OL].(2001-11-30)[2020-03-3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M0000000000000844409>.

[29]周超.节日、纪念日与法律:日本节假日法规对中国的启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30]王晓葵.明治改历与近代时间秩序的重构[C]//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会议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2011.

[31]司法省調査課.司法研究报告第25辑[M].东京:司法省調査課,1936.

[32]伊势历的激減/狩猎不正历/人们喜爱迷信的记载/发行数量实际两百万[N].読売新聞,1926-11-08夕刊(11).

[33]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J].中央公論,1964(10).

[34]文部省教学局.臣民の道[M].东京:内閣印刷局,1941.

[35]民俗学事典編集委員会.民俗学事典[M].东京:丸善出版株式会社,2014.

Meiji Calendar Reform: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Game

XIAO Yi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In 1872, Japan launched “Meiji calendar reform”, abolishing the lunar calendar which had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using the solar calendar instead. The calendar reform was a part of Japanese government’s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policy. With the support of bureaucrats and upper class intellectuals, the Meiji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n all-round transformation of old calendar, fully monopolized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calendar by means of publication management, and poured its own ideology and official belief into the calendar. Japanese government’s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calendar reflected its control over the social life of the masses.

Key words: Meiji calendar reform; calendar; Meiji restoration;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雪 箫)